

# 国家文化多样性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 ——基于东道国的分析视角

陈德球，申李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东道国文化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7—2018年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东道国国家文化多样性特征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有助于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相对于合资经营模式，文化多样性对独资经营的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好，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越显著，文化多样性与东道国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文化多样性程度提高引致的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和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性提高是提高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国家内部差异；文化多样性；经营绩效；跨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3)03-0141-16

## 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将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企业在其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多数研究认为国际化的好处是多样的，但这种好处并非普遍存在。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环境也日益复杂化，对外投资失败或经营绩效不佳等现象屡见不鲜。隐藏在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经营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落差、海外子公司合法性获取与构建的困难、国际市场竞争

[收稿日期] 2022-10-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财务行为研究”(717906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制度距离、创业投资异质性与企业创新效率”(7187204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研究”(19ZDA04)

[作者简介] 陈德球(1981—)，男，安徽望江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公司金融；(通讯作者)申李莹(1994—)，女，河南新乡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企业国际化

态势加剧、跨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的缺乏等。在此背景下,探索跨国企业海外经营能力改善路径,实现跨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创造目标,已成为当今乃至未来较长时期内,无论从国家还是企业层面都应该考虑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个体和社会认同、创新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影响社会包容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Dirienzo等,2007)。随着跨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深度和广度的增加,跨文化经营的频率、深度和广度也随之提高。已有研究表明,东道国文化通过影响战略决策(Johanson和Vahlne,2009)、组织结构与绩效(Gomez-Mejia和Palich,1997),进而影响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全过程。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国际商务领域针对国家文化与跨国企业关系的相关研究常常将一个特定国家内部的文化视作同质性的(Homogeneity)。也就是说,通过将国家文化视作一个整体,计算某个特定国家在某些文化维度上的得分,进而基于这些得分表征文化维度或者计算文化距离等指标。虽然国家文化同质性假设有助于从宏观角度分析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国家内部的差异可能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一样显著,有时内部差异甚至高于国家之间的差异(Kaasa等,2014)。因此,将国家文化视为同质性,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模糊甚至错误的结论(Tung,2008)。这一论点已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正如Beugelsdijk等(2014)指出的那样,国家文化同质性假定夸大了文化距离导致的障碍和成本。鉴于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有学者呼吁,有必要重新考虑国家文化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Tung,2008)。

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发展需求,学者们试图借鉴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文化多样性(Culture diversity)概念进行回应。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定义,文化多样性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多样性,例如在宗教方面,伊朗和爱尔兰等国家的宗教相对单一,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宗教则更加多元。之所以强调文化多样性,是因为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不仅体现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也是引导人们在智力、情感、道德和精神方面过上更充实生活的一种手段。然而,目前国际商务研究领域内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且大多围绕发达经济体企业展开研究(Dow等,2016)。为了弥补上述理论缺口,本文将从国家内部文化异质性视角引入东道国文化多样性的概念,以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东道国文化多样性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跨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绩效,期望能够突破国家文化同质性的研究框架。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将政治经济学中的文化多样性概念引入到跨国企业研究中,有助于深化国家文化与跨国企业行为绩效的关系研究。尽管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一直都在强调文化维度和文化距离等文化因素对跨国企业的影响(Kogut和Singh,1988;Bell等,2012),但他们往往基于国家内部的文化是一致性的这一假定,忽视了国家内部差异潜在的影响。相比之下,本文通过放宽国家文化同质性的假设,基于文化多样性视角考察东道国文化

异质性对跨国企业的影响,拓展了已有跨国企业研究。第二,本文从海外经营绩效视角补充了跨国企业研究中文化多样性的经济后果的文献。虽然已有研究实证检验了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对跨国并购股权选择(Dow等,2016)、海外子公司股权控制模式和劳动生产率(Oetzel和Oh,2019)、跨国并购成功率(Li和Sai,2020)的影响,但仍缺乏针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这一经济后果的探讨。因此,本文不仅衔接了文化多样性和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研究,还试图讨论了文化多样性影响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可能的作用路径,有助于揭开文化影响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黑箱”。第三,利用手工搜集整理的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经营数据,本文为东道国文化多样性的积极影响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Stahl和Tung(2014)曾指出,当前的跨国企业研究似乎过度强调了文化和制度多样性导致的劣势和负面效应,而忽视了这些差异可能带来的优势和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学术界认识到多样性创造价值的潜力,为提高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和“走出去”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东道国内部差异不仅影响跨国企业在进入前的投资决策,也影响进入后的经营决策和绩效(Chidlow等,2015)。结合政治经济学中的文化多样性概念,有必要放宽东道国内部同质性的假定,从东道国内部差异的角度出发探索文化对跨国企业的影响。一方面,文化多样性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冲突和海外经营风险,加剧海外经营的信息劣势和行为不确定性程度;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有助于形成更具创造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环境,多样、复杂的文化环境也有助于企业发展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要确定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最终影响方向如何,需要进一步区分两种效应哪一种占主导。

一方面,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可能会通过以下几种途径降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第一,在宏观角度上,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加剧东道国内部的不稳定性,提高了海外经营风险。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潜在的偏见和歧视为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信任设置了障碍,而沟通差异、信任匮乏和法律意识差异等可能会造成文化冲突和社会冲突(Fearon和Laitin,2003)。例如,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北部为伊斯兰教地区,南部为基督教区域,宗教纷争导致了长期的内战夺权。可见,频繁的文化冲突加剧了东道国内部的不稳定性,甚至可能导致政治动荡(Annett,2001),而这种类型的海外经营风险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最难以预测和防范,显著影响了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方式(Oh和Oetzel,2017)。因此,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可能会提高跨国企业在当地国际化的经营风险,进而对其经营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在微观角度上,文化多样性通过加剧信息劣势和行为不确定性的程度,增加了跨国企业的外来者劣势。对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跨国企业而言,与本地企业相比,其常常缺乏对当地政治、法规、文化和消费者偏好的了解,并且面临着更高的资本成本、更低的流动性和更少的分析师跟踪(Blass和Yafeh,2001),这种额外的成本和障碍被称为“外来者劣势”(Zaheer,1995)。其中,信息

劣势是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开展经营的主要障碍之一(Bell等, 2012)。正如国家之间的差异增加了沟通和理解的难度一样, 东道国内部的文化差异导致社会同质性缺失, 阻碍了资本和思想的有效传播, 影响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沟通和合作, 加剧了跨国企业面临的事前信息劣势。此外, 在文化多样性的国家考虑所有文化敏感性对管理人员而言是困难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偏好和品位差异较大(Alesina等, 1999), 同时融入多种文化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还增加了海外经营的事后不确定性(Dow等, 2016)。因此, 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加剧跨国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 削弱跨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绩效。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 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降低了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另一方面, 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可能会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提高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第一, 在宏观角度上, 东道国内部多样的文化环境有利于形成更为包容和开放的经营环境, 进而有助于提高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合法性。根据制度理论, 缺乏合法性将在市场准入和资源获取等方面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产生深远的影响(Darendeli和Hill, 2016)。对于文化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国家, 在各文化主体之间展开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更多, 长期的共处有利于发展更为包容和开放的态度, 这对跨国企业获取当地合法性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首先,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群体对多样性的包容度越高, 越能够平等对待外国人、同性恋、异教徒等少数派, 并对经济和政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文化多样性程度的提高, 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业的“外来者”身份更不敏感, 形成了更有利于跨国企业发展的经营环境。其次, 更为包容和开放的经营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 提高了东道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例如,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新加坡开放包容的投资环境对外资一直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 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针对跨国企业的歧视政策也就越少(王常雄, 2010)。因此, 由于缓解了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合法性挑战, 文化多样性将有助于提高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第二, 在微观角度上, 东道国内部多样的文化环境提供了更丰富的创新资源, 并且有助于发展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和组织在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处理方式上都存在不同,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助于碰撞出创造性的想法, 促进知识和企业创新(Smallbone等, 2010), 为跨国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机会。此外, 当嵌入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国家文化环境时, 虽然对跨国企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也可能会促使跨国企业提前意识到处理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进而提高了其文化敏感性(Schomaker和Zaheer, 2014)。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感知不仅有助于协调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 增强沟通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 还有助于克服组织僵化和惰性, 促进学习和创新, 把握商业机会和应对文化冲突(熊名宁和汪涛, 2020)。因此, 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在创新资源和企业能力等微观层面有助于提高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 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提高了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以上两个假说是竞争性假说,如果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负相关,则说明假说1成立,对于中国的跨国企业而言,东道国内部文化差异造成的劣势效应占主导;如果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正相关,则说明假说2成立,对于中国的跨国企业而言,东道国内部文化差异造成的积极效应占主导。

## 二、研究设计

### (一) 样本与数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且开展了国际化经营的上市公司,样本期间为2007—2018年。由于新会计准则自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中施行,以及考虑到其他核心变量的数据可得性,本文将样本区间的起始年份定为2007年。在此基础上,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处理:(1)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2)剔除ST和\*ST的上市公司;(3)剔除目的地属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以及避税天堂(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地区的投资数据;(4)为了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后,最终得到340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海外经营数据源自手工搜集整理的上市公司历年年报中关于海外子公司经营的披露信息,文化多样性数据来源于Dow等(2016)<sup>①</sup>,国家特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中国外交部,企业特征数据来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 (二) 变量说明

#### 1. 被解释变量:海外经营绩效(*Performance*)

参考McGahan和Victor(2010)以及汪涛等(2020)的研究,使用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收益率(ROA)度量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 2. 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多样性(*CulDiversity*)

如何度量文化多样性是本文的关键问题之一。自从社会学领域学者Hofstede提出用来衡量国家文化的文化维度框架之后,大量学者借鉴该方法开展了关于国家文化对跨国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然而,Hofstede文化维度框架因忽视了国家内部异质性特征而在近年来遭到了一些质疑(Tung和Verbeke,2010),引入国家内部文化差异将有助于深化国际商务领域的跨文化研究。为此,Dow等(2016)基于政治经济学对多样性的研究,采用文化分解的方式计算了各国语言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并使用该数据考察了东道国和母国语言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对企业跨境并购行为的影响。这一做法为度量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目前,Dow等(2016)提供的语言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数据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Jiménez等,2019;Jiménez和Bayraktar,2021)。进一步地,由于文化受到种族、语言、基因和宗教等多方面的影响,而语言被视为民族和文化的代表(徐现祥等,2015),因此文献常

<sup>①</sup>详见网站<http://dow.net.au>(访问日期:2021-05-12)。

使用语言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潘越等, 2017)。基于此, 本文在 Dow 等(2016)提供的语言多样性数据的基础上, 使用语言多样性代理本文关键解释变量文化多样性, 同时使用其提供的宗教多样性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Dow 等(2016)衡量语言多样性的具体做法是: 用 1 减去一个特定国家内部的每种语言使用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的平方和, 如式(1)所示。使用这种基于赫芬达尔指数的方式计算出的语言多样性的取值在 0~1 之间, 最大值 1 代表着该国内部每个人使用一种语言, 最小值 0 代表着该国内部所有人使用同一种语言, 变量取值越大代表语言多样性程度越高。

$$CulDiversity = 1 - \sum (\%)^2 \quad (1)$$

### 3. 控制变量

参考 Gaur 等(2019)的研究, 本文引入了可能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的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因素。首先,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规模 (*Size*), 使用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 资产收益率 (*ROA*), 使用企业当年净利润/年末总资产来衡量; 资产负债率 (*Lev*), 使用企业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来衡量; 企业年龄 (*Age*), 使用企业成立年数的自然对数衡量; 所有权性质 (*SOE*), 定义为虚拟变量, 若属于国有企业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其次, 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两国经济制度距离 (*EFIDistance*), 以《华尔街日报》和经济自由度指数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EFI*) 为基础衡量各国的经济制度质量, 并使用东道国和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之间差异的绝对值衡量两国经济制度距离; 两国文化距离 (*CulDistance*), 以学者 Hofstede 构建的文化维度评价指数为基础, 使用东道国和中国文化维度评价指数平均得分之间差异的绝对值衡量两国文化距离; 两国外交关系 (*Diplomacy*), 使用东道国和中国正式建交年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数据来自中国外交部; 东道国国家风险 (*CountryRisk*), 使用国家风险国际指南 (*The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CRG*) 提供的世界各国综合风险评级得分并除以 100 来衡量东道国国家风险, 得分越高代表风险越低。同时, 引入年份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年份和行业因素的影响。其中, 行业分类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制造业“C”字头代码取 2 位, 其他行业代码取 1 位, 并剔除金融行业。

### (三) 模型构建

为检验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海外经营绩效 (*Performance*) 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文化多样性 (*CulDiversity*) 作为解释变量, 并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 构建如下 OLS 估计回归模型:

$$Performance_{i, j, c, t} = \beta_0 + \beta_1 CulDiversity_{i, j, c, t} + \beta CVs_{i, j, c, t} + Year + Industry + \xi_{i, j, c, t} \quad (2)$$

在式(2)中, 下标的 *i*、*j*、*c* 和 *t* 分别代表上市公司、子公司、东道国和年份; *CVs* 代表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 *Year* 为年度虚拟变量, *Industry* 为行业虚拟变量,  $\xi$  表示随机误差项。模型中各系数的标准误均在上市公司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列示了本文所涉及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从表1的PANEL A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海外经营绩效(*Performance*)的均值为-0.094,最小值-3.091和最大值0.568之间的差距较大,标准差也较大,说明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绩效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解释变量文化多样性(*CulDiversity*)的均值为0.412,最小值0.028和最大值0.930之间的差距较大,说明不同国家的文化多样性特征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从控制变量的情况看,样本企业之间的规模差异和年龄差异较大,而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标准差较小;所有权性质的均值为25.5%,表明近 $\frac{3}{4}$ 的样本企业为民营企业。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以往研究大体类似,说明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表1的PANEL B中可以看出,文化多样性与海外子公司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2;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上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表

PANEL A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Performance</i>	3 406	-0.094	0.458	-3.091	0.003	0.568
<i>CulDiversity</i>	3 406	0.412	0.254	0.028	0.353	0.930
<i>Size</i>	3 406	22.316	1.257	20.117	22.125	26.040
<i>ROA</i>	3 406	0.064	0.114	-0.532	0.064	0.360
<i>Lev</i>	3 406	0.445	0.194	0.068	0.444	0.895
<i>Age</i>	3 406	2.890	0.286	1.946	2.890	3.497
<i>SOE</i>	3 406	0.255	0.436	0.000	0.000	1.000
<i>EFIDistance</i>	3 406	19.581	8.880	1.000	20.900	36.900
<i>CulDistance</i>	3 406	7.138	6.938	1.000	4.000	39.000
<i>Diplomacy</i>	3 406	3.713	0.258	2.996	3.714	4.234
<i>CountryRisk</i>	3 406	0.777	0.060	0.620	0.780	0.890

续表

PANEL B 相关系数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i>Performance</i>	1.000	—	—	—	—	—	—	—	—	—	—
<i>CulDiversity</i>	0.068	1.000	—	—	—	—	—	—	—	—	—
<i>Size</i>	0.107	0.016	1.000	—	—	—	—	—	—	—	—
<i>ROA</i>	0.068	-0.040	0.015	1.000	—	—	—	—	—	—	—
<i>Lev</i>	0.047	0.018	0.534	-0.317	1.000	—	—	—	—	—	—
<i>Age</i>	0.010	0.008	0.101	-0.080	0.126	1.000	—	—	—	—	—
<i>SOE</i>	0.073	0.033	0.382	-0.103	0.277	0.099	1.000	—	—	—	—
<i>EFIDistance</i>	-0.039	-0.081	0.053	-0.011	0.016	-0.046	0.063	1.000	—	—	—
<i>CulDistance</i>	0.053	0.066	-0.040	-0.047	-0.045	-0.019	-0.014	-0.276	1.000	—	—
<i>Diplomacy</i>	0.034	-0.174	-0.037	0.023	-0.056	0.053	-0.060	-0.645	0.023	1.000	—
<i>CountryRisk</i>	-0.026	-0.169	0.062	0.006	-0.008	0.013	0.019	0.727	-0.233	-0.353	1.000

## (二) 基准估计结果与分析

表2汇报了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影响的OLS回归结果。其中,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CulDiversity*的估计系数为0.103,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CulDiversity*的估计系数为0.118,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可以发现,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多样性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有助于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由此假说2得到了验证。此外,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跨国企业的资产收益率越高、两国文化距离越大、两国外交关系越好,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就越好;所有权性质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有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显著优于非国有跨国企业。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结论与Dow等(2016)的结论相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Dow等(2016)认为东道国文化多样性通过增加信息不对称和行为不确定性程度进而降低了跨国企业在并购中持有的股权比例,其关注的是文化多样性在跨国企业境外投资时的影响,而本文关注的则是文化多样性在境外投资之后的效应;其次,Dow等(2016)的研究是一项跨国别研究,其样本涵盖了多个母国和东道国,而本文的研究情境基于中国这一特殊的设定,中国丰厚的



底蕴和多样的历史文化有助于培育企业的文化适应能力，进而有助于发挥文化多样性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的结论通过证实东道国文化多样性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正面效应，回应了 Stahl 和 Tung(2014)对于学者应更加关注距离和多样性等概念潜在积极效应的呼吁，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多样性的影响，并聚焦于中国的应用情境。

表2 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

变量	(1)	(2)
	<i>Performance</i>	<i>Performance</i>
<i>CulDiversity</i>	0.103 *** (2.607)	0.118 *** (2.880)
<i>Size</i>	—	0.017 (1.549)
<i>ROA</i>	—	0.326 ** (2.295)
<i>Lev</i>	—	0.040 (0.502)
<i>Age</i>	—	-0.015 (-0.346)
<i>SOE</i>	—	0.059 ** (2.267)
<i>EFIDistance</i>	—	0.000 (0.137)
<i>CulDistance</i>	—	0.004 *** (3.125)
<i>Diplomacy</i>	—	0.116 ** (2.243)
<i>CountryRisk</i>	—	0.005 (0.020)
<i>Constant</i>	-0.025 (-0.300)	-0.849 ** (-2.350)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 R <sup>2</sup>	0.019	0.034
观测值	3 406	3 406

注：括号内为t值，t值的计算基于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估计数值在10%、5%及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 (三) 异质性分析与检验

#### 1. 股权控制程度异质性的影响

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对海外子公司实施不同的股权控制程度以减轻在东道国的合法性担忧。具体而言，较低的股权控制程度不仅可以利用合营者在当地的合法性(Lu和Xu, 2006)，还向当地利益相关者传递了合作的信号以减轻质疑和干预。相反地，较高的股权控制程度对海外子公司在当地的经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更易遭到当地政府的严格调查(Chan和Makino, 2007)。因此，采用不同股权控制模式的海外子公司

在获取当地合法性和配置当地资源的能力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对于采用不同股权控制模式的海外子公司，东道国文化多样性发挥的效应可能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按照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控制程度将全样本划分为合资经营组和独资经营组。分组检验结果如表3列(1)和列(2)所示，*CulDiversity* 的估计系数在合资经营组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CulDiversity* 的估计系数在独资经营组为正，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组间系数差异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相比合资经营组，文化多样性对海外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在独资经营组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跨国企业可以通过采取模仿现有企业或者与当地企业合作成立合资企业(Lu和Xu, 2006)等投资策略来获取当地合法性。相比合资企业，独资企业难以在短期内获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而东道国文化多样性有助于缓解独资经营面临的合法性挑战，进而提高跨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绩效。

表3 股权控制程度异质性的影响

变量	(1)	(2)
	<i>Performance</i>	<i>Performance</i>
	合资经营	独资经营
<i>CulDiversity</i>	0.061 (1.219)	0.153** (2.289)
<i>Constant</i>	-0.641 (-1.293)	-1.077** (-2.0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组间系数差异	P-value = 0.097	
调整 R <sup>2</sup>	0.041	0.027
观测值	1349	2057

## 2. 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的影响

制度观点认为，在东道国的经营过程中，跨国企业不仅会受到国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也会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法规及其执行效率等正式制度的影响。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文化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为了进一步考察东道国正式制度与其文化多样性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参考杨宏恩等(2016)和Kumar等(2021)的做法，本文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将全样本分为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进行分组检验。

表4列(1)和列(2)汇报了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的分组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CulDiversity* 的估计系数在发达国家组为正，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CulDiversity* 的估计系数在发展中国家组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组间系数差异在5%水平上显著。即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只在

发达国家组存在。这表明，东道国文化多样性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因此，在研究东道国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关系时，这一结果有助于强调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重要性。

表4 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的影响

变量	(1)	(2)
	<i>Performance</i>	<i>Performance</i>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i>CulDiversity</i>	0.114* (1.814)	0.013 (0.226)
<i>Constant</i>	-1.131** (-2.304)	-1.660*** (-3.1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组间系数差异	P-value = 0.044	
调整 R <sup>2</sup>	0.032	0.048
观测值	2 672	734

#### (四) 影响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分析和结论，已经确定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探索文化多样性影响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囿于微观数据可得性，本文试图从宏观层面探讨这一问题。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这一正向效应是因为东道国文化多样性提高了当地的对外开放程度和中国企业在该国的合法性，由此提高了中国企业在该国的经营绩效。在这一部分，本文将进一步验证东道国文化多样性与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和中国企业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分别使用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和中国企业合法性作为中介变量( $M$ )，并相应构建以下回归模型对可能的影响机制分别进行检验：

$$M_{i,c,t} = \beta_0 + \beta_1 CulDiversity_{i,c,t} + \beta CVs_{i,c,t} + Year + \xi_{i,c,t} \quad (3)$$

##### 1.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机制效应

参考李光勤等(2017)的研究，本文使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百分比作为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如果东道国文化多样性有利于提高当地的对外开放程度，那么预计 $\beta_1 > 0$ 。表5列(1)汇报了东道国文化多样性对其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可以看到，东道国文化多样性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较高的东道国文化多样性能够提高该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而影响跨国企业在该国的经营绩效。

## 2. 中国企业合法性的机制效应

参考 Han (2021) 的衡量方式, 本文使用受到东道国政府严格审查和/或被终止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数量+1 的自然对数并取负数处理作为中国企业在该国合法性 (*Legitimacy*) 的代理变量, 数据来自美国企业研究院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开发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CGIT)。如果东道国文化多样性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合法性, 则可以预计  $\beta_1 > 0$ 。表 5 列 (2) 汇报了东道国文化多样性对中国企业在当地合法性的影响。从列 (2) 可以看到, 东道国文化多样性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 东道国文化多样性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在该国的合法性, 并进而影响了中国跨国企业在该国的经营绩效。

综上所述, 在宏观层面上, 东道国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主要通过提高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和提高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性等机制来实现。本文关于文化多样性作用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路径分析有助于揭开文化影响经济的“黑箱”。

表 5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i>Openness</i>	<i>Legitimacy</i>
<i>CulDiversity</i>	11.128 ** (2.586)	0.835 ** (2.083)
<i>Constant</i>	-21.121 (-0.785)	-5.734 ** (-2.189)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 R <sup>2</sup>	0.324	0.306
观测值	3 406	3 406

## (五) 稳健性检验

最后,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以保证表 2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 1. 解释变量使用 t-1 期的值

东道国文化多样性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即海外经营能力较强的跨国企业选择了更加多样化的文化环境开展国际化经营。为解决这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滞后一期 (即 t-1 期) 的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 列 (1) 所示, *CulDiversity* 的估计系数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 2. Heckman 两步法

本文的样本仅包括拥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 并未包括没有成立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 为此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在第一阶段模型中, 样本包括所有非金融类 A 股上市公司, 因变量为是否拥有海外子公司的虚拟

变量,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阶段模型的样本仅包括拥有海外子公司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因变量为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并将第一阶段模型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作为该阶段模型的控制变量之一。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仅报告了第二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第二步回归结果如表6列(2)所示,*CulDiversity*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可以基本排除此类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 3.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

除语言之外,宗教也常被用来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为了保证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Dow等(2016)提供的宗教多样性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列(3)所示,*CulDiversity*的估计系数为0.209,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并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 4. 更换标准误聚类层级

在前面的回归分析中,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上市公司层面。参考汪涛等(2020)的做法,将标准误聚类到东道国层面再次进行回归,以减少国家层面的企业自相关,结果如表6列(4)所示。结果表明,文化多样性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更换标准误聚类层级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整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CulDiversity(t-1)	Heckman 两步法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	Cluster in Country
	(1)	(2)	(3)	(4)
	<i>Performance</i>	<i>Performance</i>	<i>Performance</i>	<i>Performance</i>
<i>CulDiversity</i>	0.101* (1.734)	0.118*** (2.852)	0.209*** (4.067)	0.118** (2.125)
<i>IMR</i>	—	0.134 (0.518)	—	—
<i>Constant</i>	-1.042** (-2.196)	-1.547 (-1.172)	-0.502 (-1.449)	-0.849** (-2.0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sup>2</sup>	0.036	0.034	0.036	0.034
观测值	1 602	3 406	3 406	3 406

##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虽不断增强,但其海外经营绩效与国际竞争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研究中国跨国企业海外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东道国的文化环境对跨

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现为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多样性。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通过影响该国的社会稳定性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着跨国企业获取当地合法性和经营资源的难易程度,从而对跨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绩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探索了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有助于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进一步地,本文探讨了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影响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边界条件。具体而言,相对于合资经营模式,文化多样性对独资经营的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好,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就越显著,说明文化多样性这一非正式制度与东道国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文化多样性通过提高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和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性进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在该国的经营绩效。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通过证明国家文化对企业绩效的潜在积极作用,本文为中国跨国企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可行的实现机制。多样的文化环境虽然会对企业的适应能力提出挑战,但同时也为缓解合法性缺失和外来者劣势问题提供了机会。为此,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应积极把握文化多样性带来的优势,长远规划投资策略和组织结构,提高在当地的企业声誉和形象;同时注重积累处理复杂文化问题的经验,提高对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的敏感度和防范能力。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完善引导、支持和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撑。政府应积极宣传东道国的文化知识,及时发布可能的文化冲突预警,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以更好地帮助跨国企业应对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参考文献]

- [1]李光勤,曹建华,邵帅.语言多样性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地区差异[J].世界经济,2017,40(3):144-168.
- [2]潘越,肖金利,戴亦一.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7(10):146-161.
- [3]王常雄.地区性行政垄断结构性差异及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J].财政研究,2010(3):22-25.
- [4]汪涛,贾煜,崔朋朋,等.外交关系如何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20(7):80-97.
- [5]熊名宁,汪涛.文化多样性会影响跨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吗——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视角[J].经济管理,2020,42(6):61-78.
- [6]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方言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报,2015,2(2):1-32.
- [7]杨宏恩,孟庆强,王晶,等.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6(4):24-36.
- [8]ALESINA A, BAQIR R, EASTERLY W. 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is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 1243-1284.
- [9]ANNETT A. Social Fractionaliza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 Size of Government[R]. IMF Working Papers, 2001, 48(3): 561-592.

- [10] BELL R G, FILATOTCHEV I, RASHEED A A.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n Capital Markets: Sources and Remed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 107-122.
- [11] BEUGELSDIJK S, SLANGEN A, MASELAND R, et al. The Impact of Home-host Cultural Distance on Foreign Affiliate Sal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al Variation within Host Countr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8): 1638-1646.
- [12] BLASS A, YAFEH Y. Vagabond Shoes Longing to Stray: Why Foreign Firms List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1, 25(3): 555-572.
- [13] CHAN C M, MAKINO S. Legitimacy and Multi-leve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Subsidiary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621-638.
- [14] CHIDLOW A, HOLMSTRÖM-LIND C, HOLM U, et al. Do I Stay or Do I Go? Sub-national Drivers for Post-entry Subsidiary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5, 24(2): 266-275.
- [15] DARENDELI I, HILL T L. Uncover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tical Risk and MNE Firm Legitimacy: Insights from Liby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6, 47(1): 68-92.
- [16] DIRIENZO C E, DAS J, BURBRIDGE J. Does Diversity Impact Competitiveness? A Cross Country Analysis[J]. *Competitiveness Review*, 2007, 17(3): 135-152.
- [17] DOW D, CUYPERS I R P, ERTUG G. The Effects of Within-country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on Foreign Acquisi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6, 47(3): 319-346.
- [18] FEARON J D, LAITIN D D.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3, 97(1): 75-90.
- [19] GAUR A S, PATNAIK C, SINGH D, et al.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 and Subsidiary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Business Group Affiliation and 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 50(8): 1253-1282.
- [20] GOMEZ-MEJIA L R, PALICH L 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national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7(28): 309-335.
- [21] HAN X. Risk Management, Legitimacy, and the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of Emerging Market MN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1, 30(4): 1-14.
- [22] JIMÉNEZ A, BAYRAKTAR S. Hello! Namaste? Within-country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Emerging Marke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30(1): 86-97.
- [23] JIMÉNEZ A, JIANG G F, PETERSEN B, et al. Within-country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9, 95: 13-25.
- [24] JOHANSON J, VAHLNE J E. 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 Revisited: From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o 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9): 1411-1431.
- [25] KAASA A, VADI M, VARBLANE U. Reg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within Europea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Multi-country Surveys[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4, 54(6): 825-852.
- [26]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 411-432.
- [27] KUMAR V, NIM N, AGARWAL A. Platform-based Mobile Payments Adoption i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Role of Country-level Heterogeneity and Network Effec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1, 52: 1529-1558.
- [28] LI Y, SAI Q.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and Religion o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Completion[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0, 54: 101294.
- [29] LU J W, XU D. Growth and Survival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 External-internal Legitimac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32(3): 426-448.
- [30] MCGAHAN A M, VICTER R. How Much Does Home Country Matter to Corporate Profitabi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1): 142-165.
- [31] OETZEL J, OH C H. Melting Pot or Tribe? Country-level Ethnic Diversity and Its Effect on Subsidia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2019, 2(1): 37-61.

- [32] OH C H, OETZEL J. Once Bitten Twice Shy? Experience Managing Violent Conflict Risk and MNC Subsidiary-level Investment and Expans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3): 714-731.
- [33] SCHOMAKER M S, ZAHEER 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Knowledge Transfer to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4, 20(1): 55-72.
- [34] SMALLBONE D, KITCHING J, ATHAYDE R. Ethnic D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petitiveness in a Global City[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10, 28(2): 174-190.
- [35] STAHL G K, TUNG R L. Towards a More Balanced Treatment of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The Need for Positive Cross-cultural Scholarship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4, 46(4): 391-414.
- [36] TUNG R L.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mperative: The Need to Balance Cross-national and Intra-national Divers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1): 41-46.
- [37] TUNG R L, VERBEKE A. Beyond Hofstede and Glob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8): 1259-1274.
- [38] ZAHEER S.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2): 341-363.

## Within-country Cultural Diversity and Foreign Subsidiaries Performance of MN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ost Country

CHEN Dequ, SHEN Liying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Culture of host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invest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Based on data of China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8,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thin-country cultural diversity of host country and foreign subsidiaries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N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ithin-country cultural diversity of host countr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MNEs' foreign subsidiaries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within-country cultural diversit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performanc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in the form of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than others in the form of a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It also shows that the better formal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host country is,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MNEs' foreign subsidiaries performance is,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formal institution of host country.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show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promotes MNEs' foreign subsidiaries performance by improving the openness of host country and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host country.

**Keywords:** Within-country Differences; Cultural Diversity; Subsidiaries Performanc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责任编辑 武 齐)